微语录

当教师拥有标新立异的创造力和自由时，奇迹就会发生。如果教师以他最喜欢、感觉最自在的方式教学，那他的课就会好得多。

——【美】罗恩·克拉克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梅贻琦

最重要的教育原则是不要爱惜时间，要浪费时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

——【法】卢梭

“教师”应该是个具有高超的德行、持重、明达、和善的人，同时又要具有能够经常庄重、安适、和蔼地和学生交谈的本领。

——【英】洛克

愚蠢的人需要受教育，好使他们摆脱本性中的愚蠢，这是无人怀疑的。其实聪明的人更需要受教育，因为一个活泼的心理如果不去从事有用的事情，它便会去从事无用的、稀奇的、有害的事情。

——【捷克】夸美纽斯

儿童不是一个事事依赖我们的呆滞的生命，好像他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填充的空容器。不是的，是儿童创造了成人。不经历童年，不经过儿童的创造，就不存在成人。

——【意】蒙台梭利

父母不应当硬要自己的子女去做与他们的直接兴趣毫不相干的事，而应当首先让他们获得力量，这种力量是通过有效地处理身边的事务而产生的。

——【瑞士】裴斯泰洛齐

成功没有捷径——真正的卓越是靠牺牲、试错，以及大量努力得来的。

——【美】雷夫·艾斯奎斯

好教师不必是那些上出成功的课或教出得分最高班的教师。好教师是那些有能力去反思一堂课、理解什么对了或什么错了、寻找策略让下次更好的老师。

——【美】金柏莉·奥利弗

语文教育说到底应该是为了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健康成长，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全面的、善于处理生活的普通公民，决不能把学生训练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或大或小的官吏，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

——叶圣陶

每个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查自己的人格。

——【苏】苏霍姆林斯基

天下没有问题儿童，只有问题家长，说得更恰当一点，只有问题人类。

——【英】尼尔

（褚清源 辑）

媒体看点

近一段时间，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央视热播。邓小平的改革从科技和教育入手，寻求突破口。而其中恢复高考，特别是教科书改革提上议程引发了很多观众的共鸣。教科书作为教育的载体，浓缩了一个时代的背影。从政治挂帅到人性回归，从千篇一律到多样多彩，新中国成立后的教科书曾经承载了太多内容。然而，直至今天，尽管关于教科书的改革从未止步，但远不能用“成功”二字来概括。教科书，究竟要何去何从？

□ 本期主持：黄 浩

“拯救”教科书

教科书的梦魇

提到教科书，现在的学生，没有几个不恨的。中学生在考试过后，集体撕书，并将之抛向天空的情景，相信每一个见过的人，都会感觉有点震撼。但是，我的中学时代，绝无恨书之感。

那时的教科书，一个特点是薄，无论数学还是物理化学，都是薄薄的一本，几根干干的骨头，几个定理。语文教科书稍微厚一点，但也厚得有限。第二个特点，是铺天盖地的政治化。语文就不用说了，近似政治课本，数理化里也充斥着政治言语和大道理。譬如计算水库体积，一定要说是为了防修反修。讲牛顿定理，一定要说中国的人造地球卫星把东方红的乐曲传遍世界。

这样的教科书，放在今天，估计多半要起发笑作用，对活跃课堂气氛大有好处。可当年的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好笑，但是，谁也不好好学，因为没有考试，连小考都没有。老师当然也就乐得“放羊”。那时的中学，学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劳动，干农活，春种，夏锄，秋收。城里的孩子还有机会进工厂练练，我们这些农场的孩子，就只能学点庄稼把式。

那时的学生，不恨教科书，一学期下来，好些人的书都是新的。别说语文课的课文，就是数理化里的文字，好些人都认不全。最后，不分青红皂白，都高中毕业。这种“坑爹式”的教育，培育了一大批事实上的文盲，现在基本上都是下岗工人。

恢复高考之后，教科书成了抢手货，确切地说，是“文革”前的教科书成了抢手货。说实在的，“文革”前的教科书，跟现在的中学教科书风格一致，当时不仅没有人恨，而且一册难求。谁有这样的教科书，谁就更有希望考上大学。高考停了10年，人都憋疯了。我那时候也在求，只是求不着而已。

第一次令我对教科书产生困惑的，是考研的时候。我本科学的是农业机械，毕业后留校教党史，被人看不起，一怒之下，愤而考研。临阵摸了摸英语，就上阵了。没学过文科的人，考文科的研究生，通史这一门，看看题都会，似乎很容易，但就是答不到点子上。历史考试，大题都离不开事件的意义。什么事件有什么意义，一、二、三、四，老师按点给分。你得踩到点上，才能得分。这个点，如果你不死背教科书，根本就踩不上。我没有学过教科书，所以，答题总是踩不到点上，结果通史才得了60多分。幸亏录取是看总分，最后还是考上了。尽管如此，明白了个中道理的我，还是心情不佳，由此对教科书有那么一点点怀恨在心了。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教科书已经经历了多次改革，但却难有起色。事实上，我们的教科书问题，出在我们的教育者对教育的理解上。教育是一个探求真理、学习常识的过程。真理在哪里，教育者也不知道，他的任务，就是带领学生一起去寻找，通过查资料，做调查，最后提出合乎道理的看法和论点。而我们的教育，教育者真理在握，把真理或者真理体系，拆解成一个个的知识点，由教者教给学生。学生的学习，就是对这些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而教科书和与之相配套的教学辅导材料，就是按照这个思路编的。不仅中小学教材如此，大学教材，多半也脱不出这个窠臼。

无疑，这样的教科书和相应的教学，对于按照这样的知识体系进行的考试，是相当合适的。尤其是数理化，中学教的知识体系大体固定，我们这样的教法，的确能培养出考试的能手。这也是中国的中学教育令人诟病，但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却总能夺冠的原因。然而，就教育本质而言，这样的教法和教科书，对学生的今后作为人的发展，是相当有害的。凡是沉进教科书里，学习好的学生，每每后劲不大。以我比较熟悉的历史教学为例，在学校里成绩越好，教科书理解越透，背功越佳的学生，后来越是做不出名堂。其他学科，大概也差不多。因为这样的教科书教出来的好学生，创造力已经被严重扼制了。

我见过太多所谓名校的研究生甚至博士生，宿舍的书架上，除了教材，没有什么书，他们就是凭着背熟教科书，考上来的，上了之后，在这个所谓严进宽出的体系，照样可以毕业。实际上，教科书对学生阅读的压制，从小学、中学就已经开始了。

教科书的存在，原本就是对学生之于书的兴趣的一种摧残。而为了应付教科书里知识点的掌握，势必要排斥其他内容的阅读。所以，在中小学，老早就出现了所谓“课外书”的概念，无论老师还是家长，本质上都对课外书取排斥态度，认为学生看多了课外书就会影响成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但是，只看教科书最后成绩好的学生，日后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了，会有什么出息呢？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样的教科书，由于其固化的模式，也妨害了人们对常识的理解。自然科学的很多定理，其实只有相对的正确性，这一点，我们的学生并不知道。而人文社科部分，我们的教科书更是将一个成见体系灌进学生的脑子里。比如我所著的《共和中的帝制》一书对于张勋复辟的探寻与描述，就有悖于教科书上重大历史事件的所谓意义，教科书上的意义是一种成见，但不背熟这种成见，就难得高分。成见多了，形成刻板印象，常识也就消失了。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鸣为腾讯网所撰文章，有删改。）

链接：教科书变迁史

建国初期教科书被政治挂帅：毛泽东最主流

在为政治服务思想的指导下，建国初期的教科书成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宣传阵地，内容多以革命史和党史为主。

这种情况下，很多新中国领导人撰写的文章或是描写领导人的文章纷纷入选教材，其中尤以毛泽东作品和歌颂他的作品最多。不但是语文教材，音乐等教材中也大量出现对毛泽东的歌颂与赞美。

中苏蜜月期以苏为师：俄语教材一统天下

建国初期，刘少奇即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当时中国学习俄语的热潮绝不亚于20世纪末期开始的英语热，俄语教材是外语教材中最多见的课本。从1949年开始，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就组织力量，对苏联10年制学校的教材进行研究和编译，此后新中国最初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以苏联教材为模本。

课本之外，课堂教学方法也几乎是苏联模式的翻版。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学观摩了课文《红领巾》的教学，随后结合苏联做法进行了评议，把苏联语文课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分步骤教课方法推荐给中国。随后，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成为中国语文课堂的中心任务，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红领巾教学法”，风行数十年。

“大跃进”时期“教育大革命”影响教材：“左”倾思想浓厚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充斥着浓重的“左”倾思想内容，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大跃进”期间，小学课本一年级第一篇是这样的：“爷爷六岁去放羊，爸爸六岁去逃荒。今年我也六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

“文革”时期变“革命教材”：被毛主席语录充斥

中国历史进入被称为“红色年代”的“文革”时期，教科书的编制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无论哪一科的教科书都成了政治的宣传册。领袖崇拜狂潮席卷祖国大地，教科书选材标准变成了“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语录、最高指示比比皆是，任何一个学科都难以幸免。

由青年学生自发组成的红卫兵团体是“文革”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也是“文革”期间教材中最为典型的形象。刚毅的眼神、孔武有力的动作、一身军装配上红袖标，这是红卫兵的典型形象，而他们手中永远握着最有力的武器——毛主席语录。

1978年新纪元：教科书回归教育工具性质

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后来有学者评价说，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许多谬误，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

1982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的要求。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推出，领袖占据教科书主要版面的情况开始扭转。领袖成了配角，教科书逐渐回归工具性质。

当代教科书：逐渐回归人性和真理

当代教科书虽然还有少量政治思想教育，但是总体来说已经回归正常，特别是理科等学科的教科书，再也看不到政治口号和“文革”语录。

而名人进教科书中也都能引起社会讨论。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刘翔被载入史册，同样入选的还有“东方神鹿”王军霞。此事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教育界人士甚至疾呼不要让刘翔进入全国教材。而去年又被媒体炒作的鲁迅被驱逐出教科书，前段时间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小学教科书，亦引发社会关注和讨论。可以说，教科书也在经历着变革。

不管怎样，当代教材逐渐回归了本来面目，也增添了多样性和人性的内涵。教材，包含了时代的发展历程，也影响了几代人的记忆。

据《新校长传媒》、搜狐教育综合整理

AD

生态文明引领学校教育文明的创新建构实践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生态文明教育创新之路

□ 徐 辉 张建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将环境教育作为渗透学科教学的重要内容加以关注；进入21世纪，正值世纪交替、千年更迭之际，学校以“十五”省教改课题《中学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机制的研究》为切入点开始课题研究和特色构建；进入“十一五”以来，学校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普通高中建设“多样化”、“特色”发展的要求，敏锐地抓住十七、十八大和新修党章中的一个共同、重要的亮点——生态文明建设，结合学校教育部重点课题《全国绿色学校辐射效应研究》，将学校绿色文化建设、生态文明教育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建构中，从此启东汇龙中学以“绿色文化、生态文明”为核心概念的课题研究和特色品牌建构进入更深、更高层次。学校先后成为由国家教育部门、国家环保部门联合表彰的全国绿色学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环保部宣教中心联合表彰的“国际生态学校”，由江苏省教育主管部门确认的“生态文明课程基地”，由省行管局表彰的“公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被省教育、水利主管部门联合表彰为“江苏省节水型学校”。

启东汇龙中学的生态文明教育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理论、有机哲学、社会建构主义等理论指引下反思和重构教学，建构更大的学习任务情境让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实现三个结合：即一实现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的配合补充；二实现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的有机结合；三实现课堂学习与生态实践体验的有机结合。

生态文明理念催生了学校“绿色课堂”的课改特色

启东汇龙中学经过多年的课题研究与绿色实践，不断深化生态文明内涵，形成绿色文化的三大特质，将这些特质赋予课堂，将教师、学生、课程、环境作为系统因子进行优化配置，建构成与自然打通、与艺术接通、与心灵沟通的生命课堂。

学校怀着开放吸纳、取长补短的博大心态，向全市兄弟学校推介学校的绿色课堂，2012年9月启东市“江海星光”高三语文、数学教研活动，2012年10月启东市“江海星光”教研活动暨汇龙中学绿色高效课堂范式展示活动，2013年承办“南通市高中绿色课堂研讨会”等进一步展示了绿色课堂的绿色文化特质。《新型教学文化下学生思维特质的培养研究》、《我们的绿色课堂主张》、《绿色课堂 思辨课堂 高效课堂》等一系列成果得以在国家核心期刊和省级刊物上发表。

生态文明教育将完善生态人格作为育人新取向

启东汇龙中学将生态文明教育落实到德性实践中，创设绿色实践的场域，通过生态实践完善生态人格。如通过垃圾分类将废物变资源、变财富、变风景、变健康、变助学，使自然之爱转变为人性之爱、德性之美。如在教室一角将垃圾由“丢弃向分类”转身，所得钱款成立环保基金，先后将垃圾分类获得的近2万元资金用于资助贫穷志坚的学生完成学业。购买盆景装扮课堂，构建生物角，实现垃圾变资源、变财富等一连串的环保行为。这些成果浓缩成《绿色行动》出版，荣获全国校园节能减排优秀案例大赛一等奖，学校因此参与《全国校园节能减排优秀案例》的编写。

学校在江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全国绿色小记者——我家乡的节能减排名星新闻作品大赛”等大赛中学校的生态文明创意成果多次获奖。2014年6月在全市生态文明创意制作大赛中荣获组织奖。

和谐绿色文化融入学校管理体系

如何将和谐绿色文化的精髓融入学校管理体系？建立绿色高效的制度文化是关键。启东汇龙中学以省级课题《中学整合型质量管理体系研究》为载体，把质量管理引入教学全过程，形成质量监控体系，在教师研修管理领域引入了质量管理理念，使教师专业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效果更加明显。在环境管理领域实施质量管理，形成了《汇龙中学环境质量手册》，使环境建设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实现有效管理。

正是在这样的和谐绿色文化中，启东汇龙中学的教师获得了高度自由的专业化发展和职业幸福感，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健全了体魄和完善了心智。在生态文明课程建设过程中已经涌现出两位特级教师、两位教授级高级教师，其中一位特级教师是教育部重点课题主持人，学校还汇集了一批学有专长、教有特色、富有影响的教师，在200多名专职教师队伍中，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队伍占三分之一，正引领年轻教师迅速成长，学校名、特、优教师梯队已然形成，2013年学校荣获长三角地区教育科研优秀团队荣誉。

在绿色高效质量管理体系框架下形成富有学科个性、彰显绿色高效特质的教学模式，如张建春老师的《高中地理“系统建构”教学模式》、韩险峰老师的《高中物理“导·测·评·练”课堂教学模式》、王晓东老师的《高中数学“小课题研究”教学模式》、周鑫荣老师的《高中化学开放性教学模式》分别发表于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效课堂：模式与案例》地理、物理、数学、化学卷，课题研究成果的辐射效应和推广价值不断显现。

多年来，学校形成“绿色环境”—“环境教育”—“绿色教育”—生态文明教育链，逐步确立了“绿色夯基 和谐共进”的办学新理念。“绿色夯基”，包含了在尊重人、理解人的基础上，夯实师生的身体、思想、品格、能力、创新等要素的基础。追求学生个性化、多元化、可持续发展，使学校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人与环境、人与文化整体发展、相互协调。

在“绿色夯基，和谐共进”的教育理念引领下，启东汇龙中学坚持特色创建和教育质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策略，即使特色内涵丰富发展，也赢得社会、家长的美誉度，赢得了“看似平凡却奇崛”的赞誉。这有力地证明了基于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的课题研究既有利于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也有利于学校全面、优质、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生的幸福成长。